

那所老屋爷爷住过，父亲住过，我也住过。

老屋位于四方城下，建于民国时期，原是一座庵，后来衰败，退出香火舞台。老屋系瓦房，破旧不堪，闪着历史的光影。老屋活在阡陌巷道的夹缝里，脚下有五六级台阶，比起周围的低矮房屋要气派些。

老屋分前后两进，中间是天井，里面住着四户人家，像一家人。我家住在后进，两间房，父母住大间，我住小间，冬冷夏热，不时还有雨滴穿瓦而来。就是这样不起眼的旧屋，父亲硬是让它生起了书香墨气。就是这样一间寒室，却有不少省内外书画大家光顾过。

1985年夏季的一个清晨，一辆黑色轿车驶入解放路，却无法开进小巷，车上下下来一位长者，在他人陪同下步行来到这老屋里。

老人面相俊朗，气质不凡，他就是我国著名书画家赖少其先生。赖老以独创的“以白压黑”技法，成为新徽派版画主要创始人，其国画气势磅礴，笔下的松涛、云雨、瀑布等，无不窥视出他那热烈的心跳。其书法以楷隶见长，方笔如削，朴拙奇崛。其篆刻取法汉印，敦厚沉凝，韵味弥深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军人的铮铮铁骨融入诗中，愈加豪情激荡。作为一名领导干部，他待人热忱，与友人肝胆相照。

赖老此行是为了考察历史文化建设。他一到安庆便告诉接待人员，要看望老朋友胡寄樵。这自是老人的谦虚，在父亲心中，赖老就是永远的老师。

赖老没有架子，和蔼地与父亲话历史，谈艺术。我在旁边站着，看他们的笑脸，听他们说话。赖老邀请父

老屋坐北朝南，青砖灰瓦，靠山而建。墙上嵌有木栅门窗，分前后两栋，中间有走廊，设三个天井，共住了同族十几户人家。老屋南面和东面各连着一一条大路，东头有一口很大的泉水井，寒冬，井口冒着热气，蹲在井边洗好一大篮子衣服也不感觉冷。西头有一口小泉水井，那是全老屋人的饮水处。地上用石条铺路，东头人家经走廊走到井中挑水，雨雪天不用走泥路。

说也奇怪，老屋的大门头却是歪着的，像棵歪脖子老树。我曾问过父亲门头歪砌的缘由，父亲说先前住在老屋的人家不兴旺，不是东家短了米，就是西家丢了油，晒在墙壁上的腌肉常常不翼而飞。请来风水先生实地察看，说是大门正对着前面大路，所以招贼，须把大门移一移，与大路错开。老屋虽歪着门头，但青砖灰瓦的气势在那个农舍多为土墙草顶的年代，足以鹤立鸡群了。

父亲说老屋是我们家族几代人的骄傲，它是祖父的祖父建造的。那时建一所这样的房子实属不易，它是太祖们辛苦劳作、勤勉好学、不懈追求上进的象征。当年太祖兄弟俩为逃避战乱和灾荒，躲进了深山。初来乍到常受当地人欺压，长在地里的玉米、田里的稻子都被人抢收了去。哥哥下定决心，再苦再累也要供弟弟读书，将来好出人头地撑立门户。弟弟果然很争气，发愤苦学，终于功成名就，家境也渐渐好起来，故建了老屋。从此，族人有了个习惯，不管家境怎样，



雾绕天柱 张云 摄

亲陪同他考察，两天里参观历史遗址七八处，父亲为赖老作了详尽的介绍。

来寒舍较多的是著名鉴定家、画家石谷风先生，印象中有两三次。石老博闻强识，致力于文博研究，出版专著几十部，大学者启功、史树青等对他赞誉有加。石老把考古上的慧眼用于绘画上，早年师从黄宾虹，又得张大千指点。曾受江西庐山纪念馆之邀，临摹仿制了一幅四尺整张的唐寅《匡庐图》，其神韵几可乱真。

1979年夏，石老出差完毕，特地绕道安庆逗留一天。他个头不高，微胖，慈眉善目，那抑扬顿挫的京腔，煞是好听，老人开朗，喜欢说笑。他对菜肴不太讲究，喜欢吃北方大馍，我

母亲听闻，跑了好几里路，买回一大包馒头。那天父亲约几个朋友前来聆听石老教诲，石老也高兴地为他们作画，无论大幅山水还是小幅花卉，都让人饱爱不已。尤其那活泼的小鹿，姿态各异，笔墨见神，无怪乎有“画鹿第一人”之称。晚上客人散去，石老坚持要为家父画画，父亲说：“今天您累了，就不画了。”他说：“那不行。”于是，桌上又铺上了一张大宣纸。昏暗的灯光下，石老又忙活了两三个小时。

1994年石老到安庆开会，那时我们已乔迁新居，条件改善了不少。老人很开心，画了一幅《柏鹿图》，柏树满铺画面，苍劲挺拔，三只小鹿欢

## 老屋

储淑芬

每一代都要培养一个读书人。同时也立下了规矩：无论家境富有还是贫困，地位高还是低，都不得欺压乡邻，要乐善好施。

祖父兄弟四人，他排行老三，是个读书人，更是个德高望重的绅士，他利用老屋宽敞的房子办了一所私塾，也让穷苦人家的孩子来上学，因而深受乡邻尊重。特殊年代，老屋因得到乡邻的庇护，从而完整地保全了下来。祖父辈中唯一长寿的是我二爹，那时大概有七十多岁，叔父们对他都很孝顺，哪家要是称个斤把肉或杀个鸡鸭什么的，都要邀请老人到家里来一起吃。老屋西头有一棵高大的栗子树，每当秋天栗子成熟时，一阵秋风扫过，地上便洒下红红的栗粒儿，我们这帮孩子便抢着去拾，父母却说说要积攒着送给二爹炖猪肉吃。农闲时，二爹家时常有说书的先生来，他手里拉着胡琴，眼睛半睁着，有时还泛泛白眼，嘴里一会儿唱一段，一会儿说一段，声调时而高，时而低，逗得大家不时地哄堂大笑，这给单调而寂寞的农家生活带来了许多欢乐。

十几户人家住在一起，孩子之间闹别扭时常有，但姑娘们从不因此而红脸，大家和和睦睦地相处

着，东头人家栽的水果成熟了，要往西头人家送一点，西头人家要是打个豆腐或熬个糖什么的，要往东头人家送一点。只要谁家有什么好吃的，全老屋的人都能尝尝鲜。

老屋前面有一块特大的稻场。炎热的夏天，灼热的太阳一落山岗，每家的凉床、竹椅子、小饭桌便搬到了稻场，劳累了一天的人们一边乘凉，一边喝着稀粥，摇着芭蕉扇。这时，父亲总是指着天空教我们辨认哪是银河，哪是牛郎、织女星，津津有味地说着牛郎织女的故事。说月亮里住着嫦娥、吴刚、玉兔，还长着一棵特大的桂花树。吴刚因违犯天条，被玉帝罚去伐桂，砍一斧长一斧，吴刚日夜砍个不停，桂树却永砍不倒。父亲说这故事给人类的教训是：人不能犯错误。晴暖的冬日，全老屋的人都到稻场上晒太阳，被太阳晒得黑红的叔父们一边抽着旱烟，一边拉着家常。姑娘们纳着鞋底，或缝补衣衫，或摇晃着睡在摇篮里的孩子，众人时而低头细语，时而仰面大笑。稻场上最热闹的时刻是放露天电影，每当放映队一到，稻场的正前方就竖起两根杆子，中间挂上一块白幕布。这时孩子们欢呼雀跃着，早早就把家里的椅子、凳子请

腾而来，灵气顿生。最后还写下：“为寄樵道兄补壁。”

艺术领域里，跋涉者众，有早年扬名的，也有大器晚成的，无论何人，皆初心不移。黄叶村先生的书画金石造诣精深，水墨青绿并能，工笔写意兼擅，以画竹独步画坛。黄老在那个年代曾受过冲击，日子过得艰苦，但毛笔始终握在手中，画作清亮，透出作者内心的向往。性格耿直，不求闻达，便是他的写照。

1970年代，家父邀黄老来安庆做客，其实他早年也曾在这里工作过，与安庆有着至深的渊源。他面庞清瘦，岁月的沧桑早已刻进眼帘中。父亲裁好大大小小的一叠宣纸，又取出仅有的几支颜料，放在桌边，“黄老，您随便画。”他特别认真，也很谨慎，伏在破旧的方桌上挥毫，画累了，歇一会，再继续画。简单的中餐之后，他也顾不上休息，十几幅画作一一署款。由于此行未带印章，也只好如此了。父亲说：“没事，下次去您家再补盖。”老人还客气地说：“浪费了你不少纸啊。”父亲连忙应道：“哪里话，我求之不得呢。”

后来这些画还没等补上印，就被父亲的朋友们纷纷索要而去。遗憾的是，黄老的画我至今未珍藏一幅。

1989年夏，父亲恩师著名国画家徐子鹤先生从上海来安庆，不巧家父正在外地开会，没机会碰面，只好嘱学生接待、陪同。不然的话，徐老一定会屈驾前往我家小室，那儿也一定会留下老人家爽朗的笑声，还有那泼墨的风采。

老屋早已不存，先生们及家父也先后西游，但这些过往依然还在，且鲜活如初。

到了场地，又催促母亲快点烧饭。放映的影片很多，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《闪闪的红星》，潘冬子的形象深深地印在了我们的脑海里，也很快学会了《红星照我去战斗》这支红色革命歌曲。

有一年夏天，一场特大的洪灾袭来，屋后的山坍塌滑坡，一块巨石滚落到我家里，父母怕不安全，选址新建了房子。父亲把损坏的房子修葺后交给了三叔，这样我家就离开了老屋。1980年代，堂姐堂妹们先后出嫁了，堂兄堂弟们都先后搬出老屋建了楼房。而老屋实在太老了，终于不堪重负，被一间间给拆了，连基石都挖走了，只留下空旷的一片平地。

这经历了岁岁年年、风风雨雨的老屋，终于完成了它的使命，退出了族人生息繁衍的舞台，它终将被世人淡忘直至忘却，只有它的影子一直留在我们的记忆里。

